

二〇〇五年六月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的態度與影響

詹恩勝*

美國傳教士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關係，可追溯至洪秀全在廣州浸信會教堂向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學道的期間，此經歷對於日後上帝會的宗教內涵曾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太平天國之役初期，由於美國傳教士對清廷宗教政策的不滿，因而對這場具有基督教色彩的運動表示歡迎和支持。但是，隨著對於太平天國的瞭解逐漸加深，美國傳教士的態度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轉變，他們在上海《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等報刊上發表的通訊，除了影響外國人士對太平天國的觀感之外，也經常成為歐美外交官在實行對華政策時塑造輿論的依據。太平天國之役後期，清廷與列強簽訂的北京條約確認了傳教士赴內地傳教的權利，而美國傳教士在體認到難以改變太平天國宗教內涵的謬誤後，其對太平軍的態度也愈益冷淡。1862年羅孝全的離京，可視為傳教士與太平天國之間關係的結束，此對於太平天國往後的對外關係，也造成頗為不利的影響。

關鍵詞：洪秀全、羅孝全、浸信會、上帝會、北華捷報、北京條約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前言

十九世紀前半期，美國社會的宗教運動蓬勃發展，許多新教團體相繼成立，他們傾向改革社會風氣，懷著濟世的精神，致力於教育和慈善事業。此種精神對於來華的美國傳教士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他們努力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明的理想，期望最終能改良中國社會。美國人此種文化使命感，在太平天國之役時期，可說是美國對華關係發展上的一項顯著特點。

1830年，美國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牧師來華傳教，揭開了美國在華福音事業的序幕。此後浸信會、衛理公會和聖公會也先後成立海外佈道會，美國首次海外宣教的浪潮開始興起。然而，由於當時清廷的禁教政策，因此傳教士的主要目的仍在於爭取宣教的合法化和為福音事業作準備。美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最初侷限於廣州和澳門，而且無法從事公開的佈道活動，僅能寄宿於美商公司中從事聖經的翻譯和其他的傳教準備工作。及至中美望廈條約簽訂後，美國的傳教活動遂由廣州擴展至其他四個通商口岸，即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1850年代以後，美國對華貿易逐漸由廣州轉移到上海，此後上海也成為美國在華傳教事業的中心。50年代太平天國的興起，曾引起美國傳教士頗高的興趣與熱誠，而此種對於太平天國的期望，也成為他們往後在華尋求擴展傳教機會的心向。

本文旨在探討美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態度與影響，首先將追溯美國南方浸信會牧師羅孝全與洪秀全之間的早期關係及其對於上帝會教義的影響，接著探討太平天國興起後，美國傳教士對此事的印象和期待，並分析傳教士與太平天國領導階層之間的互動及宗教論辯，最後將討論美國傳教士與天朝關係的結束及其所造成的影響。本文除了參考《美國人與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與《太平叛亂與西方列強》(*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等中西文專著的研究成果之外，並參酌《太平天國詔諭及書翰》、《太平天國的歷史與文獻》、《太平天國典制通考》、《西方人對太平天國的報導》(*Western Reports on Taiping*)和《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等相關的史料彙編，期能對美國傳教士態度的轉變，及其如何對太平天國的發展造成影響等問題，有更為深入的認知。

一、美國傳教士羅孝全與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早期關係

(一)洪秀全的早期經歷及羅孝全的宗教影響

美國傳教士與太平天國的關係，可追溯自 1840 年代。洪秀全於 1847 年曾在浸信會牧師羅孝全的指導下，研習基督教的教義，這些經驗對日後太平天國曾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洪秀全早年因屢試不第，加以受到梁發所著傳道書《勸世良言》的影響，而與馮雲山、洪仁玕潛心研習基督教義，並決心向世人宣講崇拜偶像之罪與信靠真神上帝之重要。¹1844 年，他從廣西返回花縣，繼續於家鄉從事教書和傳道，並陸續著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訓》等作品。1845 年，美國傳教士羅孝全的教堂「粵東施蘸聖會」在廣州南關天字碼頭正式成立。至 1846 年底，洪秀全得知羅孝全在廣州傳福音的消息後，便萌生了前往廣州向其問道之意。當時羅孝全亦獲悉洪秀全在鄉下自行傳道的經歷，而委託其助理致函邀請他來廣州協助宣教。因此，在次年 3 月洪秀全即偕同洪仁玕從花縣來到羅孝全的教堂。當他們到教堂之初，即各呈交一份的自述，洪秀全曾於其中詳述自己獲得《勸世良言》和信仰上帝的經歷，以及病中所見的異象。後來羅孝全在寄給友人的信中曾表示：這二份自述的內容「讀後使我確信主已樂於感化他們的心，使他們拋棄偶像來尋求救主。……其中一位的陳述簡直和羅馬百夫長科爾乃略(Cornelius the Centurion)的異象差不多，若是在使徒時代，我就會用聖經的語言坦白地說，他見到天使的景象，天使們向他指示一些事物。……他已學到的是，偶像崇拜是錯的，所以他很快就拋棄了偶像，並教別人也這樣做。」²他在信中盛讚洪秀全與洪仁玕的到來，認為此係傳道時意想不到的鼓舞。由此可知，洪秀全在此時所述之異象，應未包括後來所宣稱的上帝之子和耶穌之弟的說法，否則羅孝全在信中不可能對二人有如此高度的讚美。

洪秀全在教堂研讀基督教經典一個月後，期望能夠接受洗禮。此時，洪

¹ 周燮藩，《中國的基督教》（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130。

² 這封信是羅孝全於 1847 年 3 月寫給友人的，並曾在是年 7 月的《浸信會旗幟和西方先鋒》刊物中發表。參照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403。

秀全所想走的道路，是加入教會和宣傳福音，而非後來的革命之路。然教堂的兩位黃姓助理，擔心洪秀全可能會取代他們的職位，而刻意告其應主動要求每月的津貼。在他受洗之前，教堂舉行了公開的考核，當時羅孝全曾申明加入教會與求職或薪俸報酬絕無關聯，但洪秀全則表示自己經濟情況拮据，擔心加入教會後將沒有生活來源。因此，羅孝全懷疑洪秀全受洗的動機不純正，故宣稱洗禮將無限延期。洪秀全對於申請受洗未獲核准，感到相當失望。由於在廣州生活無著，又不知何時才能再受洗，他遂決定離開廣州，去廣西與馮雲山會合。此後，洪秀全無論在事業與信仰上，均開始邁向新的道路。至於洪仁玕則於學道一個多月後，即已先離開廣州，後於瑞典籍牧師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處學習基督教義，並曾於上海倫敦傳道會工作。而在此期間的閱歷，則對其往後在太平天國的作為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洪秀全在返回廣西後，在宗教理念上也逐漸產生變化，但他在廣州教堂三個多月的學習，對他仍有一定的影響。羅孝全的神學觀念，是屬於傳統基本主義的正統派，將其他宗教均視為異端與邪教，並全力抨擊當地的偶像崇拜。反觀洪秀全在接受基督信仰初期，雖也對佛、道教產生排斥，但是未有大肆毀壞寺廟偶像之舉。至 1847 年返回廣西後，即屢有破壞寺廟偶像及排斥民間神祇之事，此雖含有政治目的，但在宗教理論上很可能是在廣州時受到羅孝全基本主義的影響。在未遇到羅孝全之前，洪秀全曾將「上帝」二字書於紙上作為崇拜，並且用柱香和金紙禮拜。當他瞭解這是錯誤後，便立即將此儀式取消。因羅孝全認為「崇拜」僅能對上帝而言，洪秀全後來即禁止他的信徒在名片上使用「拜」字。此外，太平宗教的信徒在禮拜聚會時，通常會唱讚美詩來敬頌上帝，講道的主題也是以上帝的憐憫與耶穌的賜福為中心，然後訓誡世人要對自己的罪過懺悔，禁止崇拜任何偶像，並且以誠摯的心來信仰上帝。當信眾開始禱告時，則會由一位代表來吟誦禱告詞。³ 由上述可知，上帝會在宗教儀式中的許多特色，很可能受到了羅孝全教會的影響。然而，上帝會的教義雖包含了部分基督教義，但其核心部分仍為洪秀全的新

³ 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台北：華興文化事業中心，1983 年），頁 6。

啓示與天父天兄下凡的事蹟，此亦爲太平軍鞏固統治與凝聚會眾向心力的精神基礎，而這在往後傳教士與太平天國的交往中即造成了相當的阻礙。

(二)羅孝全往訪天京的計畫及其與外交官的矛盾

太平天國運動初興之際，羅孝全對其發展原本未抱持太大的關注，且當時他所能獲得之相關訊息也頗爲有限。及至 1852 年 9 月，羅孝全至香港訪問韓山文牧師時，曾閱讀到洪仁玕之前留於韓山文那裡有關太平軍的早期文件，他才驚訝地發現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就是他以前的學生。此後，羅孝全對太平天國的發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熱切地希望能夠往訪太平天國。他認爲洪秀全會需要大批的傳教士，而他也能夠爲太平軍提供聖經和各種傳道書。羅孝全期望太平天國起事是他們所認知的基督教化運動，而他身爲洪秀全過去的老師，到南京之後便能大力推進並完成這項運動。他認爲「已經接受過傳教士教育的領袖，將是容易會見並肯聽教訓的。雖然在這個國家，他的地位是高貴的，……他將充分學習基督的真理，然後在宣教事業上和傳教士進行合作。」⁴ 然而，太平天國的宗教和政治有其本身的特色與內容，與西方傳教士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而 1853 年的洪秀全，和 1847 年之時相較，也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天父天兄下凡事蹟的出現，及洪秀全以上帝之子自居以後，太平天國的宗教已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1853 年 3 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羅孝全收到洪秀全邀請他到南京傳教的信，他曾多次計畫前往太平天國境內，但當時清廷嚴格限制外國傳教士進入內地，而且訪問太平天國也與美國的中立政策不符。因此，從 1853 年起長達六年多的時間，羅孝全前往天京的嘗試皆未能如願。

太平天國興起初期，許多美國傳教士都認爲太平軍的宗教信仰與基督教教義相仿，其事業的成功將有助於福音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羅孝全在得知其領導者的身份後，更以高度的熱誠來關注並讚揚太平天國的革命。然而，當時美國駐華公使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卻認爲美國應支持清廷，否則

⁴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pp. 69-70. 轉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287-288。

漫長的內戰不僅將妨礙對華商務的發展，甚至還會導致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他在呈送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即表示：「美國的最高利益，是加入支持中國政府的行列—維持這裡的正常秩序，並使這個政府得到新生。不能坐視中國變成無政府的狀態，最終成為歐洲野心的犧牲品。」⁵ 他深信，中國的穩定是美國的最高利益所在。馬沙利的對華政策，曾遭到美國在華差會和傳教士的強烈不滿。當時羅孝全前往南京的計畫，即為雙方產生矛盾的顯例。羅孝全曾多次要求馬沙利同意他往訪太平軍，但皆為馬沙利所拒，馬沙利甚至表示若是羅孝全執意要前往，將受到美國法律的處分，或是被強制遣送回國。及至 1854 年 4 月麥蓮(Robert M. McLane)接替馬沙利的職位後，也同樣沒有回應羅孝全所提出的要求。由此可知，當時美國傳教士關注的是福音事業，而美國外交官則堅持其個人所評估的國家利益。

隨著太平軍在長江流域的迅速進展，除了羅孝全牧師之外，當時大多數的美國傳教士對於太平天國的情況，均抱持高度的興趣與熱誠，並嘗試前往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訪問。以下將對太平天國興起後美國傳教士所表現的態度與活動作更為深入的探討。

二、美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印象與期待

(一)美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的初期認知

隨著 1840 年代五口通商口岸的開闢和商館制度的廢除，來到中國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外籍傳教士也愈益增加，傳教事業在中美關係中遂開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據 1855 年的統計資料，中國境內大約有 75 名的基督教傳教士，其中美國籍傳教士有 46 人，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⁶ 不少美

⁵ 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S. and China*, Series 1, Vol. 4, Doc. No. 29. 轉引自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93。

⁶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著，張匯文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63 年），頁 637。

國傳教士陸續都曾參訪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並和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有過不同程度的接觸。太平天國之役初期，美國傳教士發現太平軍的宗教信仰與基督教義在基本上相當類似，甚至認為這是上帝造就的一次有利於福音的革命，將使在華的福音傳播得到相當大的助益。1851年，美國理事會牧師衛三畏(S. Wells William)首度報導了太平軍起事的情況，並指出太平軍反對所有崇拜偶像的傳統信仰。他也表示，「盼望上帝能在中國此隅，能替傳教士開出一條道路，以便傳揚福音。」⁷雖然當時美國外交官對太平天國抱持較為保留的態度，但美國傳教士卻以此為擴展在華福音事業的重要契機。美國的安息日會在1853年的一份年報指出，「將太平天國視為是震撼全世界，並預示天國的榮光將要降臨的偉大運動，並不是過度的熱情。」⁸美國民間的輿論亦對太平天國充滿好感，甚至抱持著一種中國人即將信仰基督教的期望。

1853年，第一位往訪太平天國的傳教士，是美國南方衛理公會的戴作士(Charles Taylor)醫師，他曾前往太平天國所控制的鎮江停留三天，返回後也發表了他對太平天國的觀感，他認為太平天國對基督教義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揉雜了迷信，領導者達到絕對權威的要求。他也注意到，太平天國對《舊約》的重視有過於《新約》，他們採用「十誡」作為生活的準則，此外，他們實施一夫多妻制，並視消滅敵人為其宗教的義務。⁹戴作士的親身觀察，和日後其他傳教士翻譯的太平天國書籍，使許多人對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已有較為完整的概念。而當時許多教會人士，認為太平天國對於基督教義有部分的誤解，故應多派傳教士去幫助宣揚正確的教義。而他們對於太平天國也多抱持樂觀與嚮往的態度。例如，美國浸信會教士曾表示太平天國乃是在正確方向下發展的廣大運動，教會此時的責任是去指導它和淨化它。美國傳教會牧師裨治文認為在戰爭結束後，太平天國無疑地將會比目前更注重其人民

⁷ "S. W. Williams to Anderson, Canton, May 22, 1851," Archives of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South China Missions*, Vol. 3.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9。

⁸ H. Cahill, *A Yankee Adventure* (New York: 1930), p.272. 轉引自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頁18。

⁹ *Christian Advocate and Journal*, September 22, 1853.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26。

的宗教教育，故將需要大量的傳教士與老師。美國聖公會刊物《傳教的精神》八月期，即曾表示相信太平天國會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並將基督教傳佈於中國。¹⁰1853年在上海美國的浸信會牧師晏瑪太(M. T. Yates)，甚至還會協助途經上海的南王馮雲山子侄二人，表示能夠協助他們潛往天京。1854年5月，美國公理會牧師裨治文以美國駐華全權外交委員麥蓮的譯員身份參訪天京，作了為期六天的考察。他對於太平天國在行政管理與社會秩序的維繫方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他認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不是一場基督教運動，而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也僅是名義上的基督徒。¹¹總的而言，透過傳教士初步的考察和報導，美國傳教士逐漸瞭解太平天國的情況，雖獲知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基督教可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差異，但對於在華的福音事業仍懷有良好的願景，並期望能在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施以福音真理的教導。

(二)185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傳教士的態度

自1854年以來，太平天國在軍事和內政上皆面臨了不穩定的狀態。是年5月，太平天國的西征軍為曾國藩的湘軍所阻，而展開了以後數十年間的長江流域爭奪戰。此外，1853年底天京所派出的北伐軍，於1855年春也已全數瓦解。在太平天國內部，東王楊秀清的權勢日益膨脹，因而更加跋扈，他甚至公開對天王侮辱和指責。東王權勢的增長和跋扈也引起了其他諸王的嫉視和反對，至1856年，諸王間的衝突終於全面爆發。此長達數月的內鬨，大幅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實力，使得許多在華的美國傳教士頗為失望，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也轉趨冷淡。隨著太平天國領導階層間的內鬨和在軍事上的失利，在1855年至1859年期間，往訪太平天國的外國傳教士也逐漸減少。在此期間，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裨治文、丁韋良(William Martin)等已升任為美國駐華外交委員或外交代表，他們一方面致力於要求修約的活動，期望從清廷方面獲得更多的權利；另一方面，他們仍繼續期望太平天國

¹⁰ "Rebellion in China," *Spirit of Missions*, Vol. 18, August 1853, p. 285.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30。

¹¹ *North China Herald*, Jun. 22, 1854.

在宗教上，能夠將拜上帝會轉變為純正的基督教信仰。他們認為，基督教福音在太平天國的信仰中雖遭到曲解，但其未來的發展與改善仍充滿了良好的願景。賀博森(M. S. Culbertson)牧師在佈道會中即讚揚太平天國實為「天穹所設計，在此民中專為傳播福音而預先鋪設之路。」此外，北美長老會傳教士丁韪良曾屢次於《北華捷報》中，發表有利於太平天國的通訊。他更多次致函曾任駐華公使的美國最高檢察官顧盛(C. Cushing)，希望美國政府能聲援太平天國。他在信中不僅同情太平天國的革命，更建議美國政府應承認太平天國政權。他為太平天國的異端色彩作出辯護，認為太平天國的革命，實可「媲美克倫威爾的義舉」，洪秀全的升天受命的經歷，則「可比之昔時君士坦丁之得見十字架旗而助其戰勝。」至於洪秀全「自稱為上帝之子，不過意指其職位，而非其本性。因其所刊行各書中，並無提及其出生時的奇蹟。……他不自承具有屬神的本質，此又可於其在永安所頒之詔旨得到證明。」¹² 丁韪良認為，洪秀全「無論其個人的人品性格有何缺點，他現在正操持著重生中國的唯一機構。」¹³ 因此，「這個革命的成功，對於基督教是大有益處的；反之，它的消滅卻是大有害的。」¹⁴ 丁韪良的呼籲，反映了許多美國在華傳教士的期望，雖在美國政界卻無法得到積極的回響，然而傳教士對於太平天國普遍的好感，亦長期地引起了美國外交官的關注。此後，美國當局也逐漸不再禁止傳教士前往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轉而通過他們以瞭解太平天國的宗教和通商政策。另外，有部分傳教士則公開聲明，他們的目的僅在於傳播福音真理，且不會給予太平軍在政治上任何的支持與鼓勵。

事實上，此一時期可說是傳教事業最艱難的時期，佈道工作的進展也相當緩慢。例如裨治文來華傳教的 17 年後，才於 1847 年吸收了第一位信徒，衛理公會則於來華宣教的 10 年後，才為第一位中國信徒施洗。且當時大多數的信徒，係因生活無著之故而加入教會。根據 1853 年的統計，西方來華傳教的各差會，總共僅吸收了 350 多名中國信徒。¹⁵ 由此益可見十九世紀中期傳

¹² *North China Herald*, Jun. 7, 1856.

¹³ *North China Herald*, Jun. 13, 1857.

¹⁴ 同註 12。

¹⁵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頁 16。

教士在福音事業推展上的艱辛。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太平軍尚處於不穩定的時期，且其宗教也展現出異端的色彩，但美國傳教士對於前往太平天國的區域內傳播福音，仍舊抱持相當程度的期望。因此，在 1860 年代以後，隨著內戰情勢的轉變和太平天國對外新政策的實施，即有許多美國傳教士前往太平天國境內訪問。

(三) 洪仁玕的友誼政策與美國傳教士的期望

1860 年代以後，太平天國的軍事重振，不僅擊潰清軍的江南大營，使天京解圍，並在華東地區建立了穩固的勢力。而這也讓不少外國人士對太平天國再度刮目相看。因此，1860 年至 1861 年，又形成了美國傳教士往訪太平天國的第二個活躍期，此時也正是洪仁玕實行對外友誼政策的時期。洪仁玕為爭取西方國家對太平天國的承認與支持，而積極對外展現友誼的態度。在他的對外政策中，為防止中外人士產生衝突，對於外國人進入內地雖仍有限制措施，但卻歡迎「牧師等並教授技藝之人入內教導我民。」此外，洪仁玕於《資政新篇》〈法法類〉篇中曾提及：「花旗邦即米利堅，禮義富足，以其為最。……現有羅孝全、裨治文、花蘭芷、高先生、晏先生、贊臣先生、寡先生與小弟相善也。」¹⁶ 他在美國傳教士中，首先提及羅孝全，係因前述 1847 年時曾在廣州向羅孝全學道之故，且羅孝全與太平天國之關係最為密切。至於美國公理會只提裨治文，而未提伯駕與衛三畏，是因二人已任職美國外交事務，並脫離了教會工作。至於其他傳教士，則多為美國南方浸信會和美國長老會的牧師。在洪仁玕所熟識的外籍人士中，除英國領事密樂迪(Thomas Taylor Meadows)外，其餘皆為西方傳教士，證明其與基督教牧師來往密切。而其中除羅孝全以外，皆為他於 1852 年到達香港後所結納者。¹⁷

1860 年太平軍展開東征後，取得了蘇州等華東地區的城鎮，使得在上海的傳教士前往太平天國境內變得更為容易。因此，由上海往訪太平天國的美國教士也逐漸增加。在 1860 年 6 月，有三位美國南方浸信會的牧師—花蘭芷

¹⁶ 洪仁玕，《資政新篇》，收入《太平官書十種》（台北：台灣華文書局影印），頁 8-10。

¹⁷ 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307。

(J. L. Holmes)、赫威爾(J. B. Hartwell)和克勞弗(Clawford)，前往蘇州謁見忠王李秀成，透過這次訪問，他們對太平天國的印象變得相當良好。他們認為太平軍的宗教觀念和儀式，在很多地方與西方傳教士的類似，包括定期的宗教會議、讚美詩的吟唱、主息日的觀念與洗禮的施行等。而他們堅決反對偶像崇拜的信念和毀壞寺廟偶像的行動，也令傳教士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花蘭芷對此即欣慰地寫道，「神在此地以人的憤怒來讚美祂，是很清楚的了！」¹⁸當時美國傳教士們也認為，太平天國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皆比大清帝國要進步。¹⁹特別是他們對傳教士的禮遇，甚至歡迎牧師住宿於他們的官邸，這無非是為在華的福音事業開創了一個新天地。此外，太平軍在軍事上的進展，也顯示出最後將戰勝清廷的可能性，而屆時傳教士對太平天國的立場遲早需要澄清。總的而言，太平天國信仰所流露的基督教特質、對外的友誼政策及其勢力的進展，使得來訪的美國傳教士充滿了期待。由於這三位傳教士的有利報告，在上海的基督教會人士中，再度引起了一陣對太平天國好感的熱潮。

1860年8月，太平軍在進向上海的過程中，曾遭到守城的英法聯軍所阻擊，但後來卻完全未還擊而撤離。當時有很多美國傳教士對之抱持同情的態度。美國南方浸信會牧師克勞弗曾指出，許多外國人士皆認為英國公使普魯斯(Frederrick Bruce)應對此次事件負最大的責任，多數人皆期望英國政府會將普魯斯調離中國。南方衛理公會牧師孔倫瀚(W. G. E. Cunningham)也以此次太平軍所表現的友善態度，來批評那些反對太平軍的人。²⁰是年10月底，英法聯軍之役迫使清廷簽訂了北京條約，允諾外國傳教士前往內地傳教的條款也再次得到確認。然而，太平軍先前的友善態度及其在華東的軍事進展，仍使得不少美國傳教士希望前往太平天國境內傳教。例如美國南方衛理公會牧師艾倫(Young J. Allen)和南布斯(J. W. Lambuth)即於1861年1月前往

¹⁸ Holmes' account, June 29, 1860, loc. cit.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103。

¹⁹ 鄧嗣禹，〈太平天國之興亡與美國之關係〉。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三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390。

²⁰ "Letter of Cunningham, Shanghai, September 3, 1860," *Sixteenth Annual Missionary Report of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61), p.91.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123。

蘇州與天京，訪問了洪仁玕等領導階層。兩位傳教士認為太平天國當局頗為期望與外國人維持友好的關係。而他們所展現的友善態度及其邁向成功的遠景，更使艾倫牧師認為到太平天國統治區域內建立傳教據點是最佳的選擇。

²¹ 然而，傳教士對太平天國的好感與期望，在往後數月間雙方關於基督教義的辯論之後，再度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變化。

三、美國傳教士與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的宗教論辯

(一) 太平天國宗教信仰的特質與傳教士的期望

從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時起，外國傳教士即開始與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就宗教方面的問題進行辯論。這場關於宗教問題的辯論，直到 1862 年羅孝全離開南京後才結束，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洪秀全在末起義前，曾追隨羅孝全牧師學習聖經數月，後因故未接受洗禮而離開，其間曾對基督教義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認知。但後來他卻認為自己的使命與基督不同，也認為以政治和軍事手段來加速改造世界是合理的，這也使得太平天國的宗教含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精神基礎，他對自己的幻想始終深信不疑。1860 年後，他甚至放棄政府的權責，不輕易接見任何人，並表示天父會為他解決一切問題。長期以來，他對傳教士的態度有其一貫性，他尊重傳教士並且歡迎他們蒞臨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但是洪秀全認為傳教士來華的任務是要為他工作，因為他正是天父的次子和耶穌的弟弟。他在 1858 年邀請羅孝全到天京，即是因為他曾向其透露過他所見的異象，而他也期待這些外國傳教士能夠熱誠地為太平天國服務。洪秀全雖然很喜歡閱讀基督教的書籍和文章，包括新、舊約聖經和《天路歷程》的中文本，但是他從這些讀物中只選取對自己主張有用途的資料。平時的閱讀未能改變他的信仰，反而更堅持他個人的宗教理念。此外，洪秀全認為他的言語是所謂的「真

²¹ “Allen’s letter to Mrs. Talley, Shanghai, May 30, 1861,” from Candler, p. 76.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 128。

約」，這是在同一福音中，除了《舊約》和《新約》之外，另外所加的一約。傳教士在瞭解太平天國宗教信仰的內涵之後，深切期望能改善太平天國此種錯誤的宗教觀念，他們認為透過對於宗教問題的辯論，將有助於釐清太平天國一些偏頗的宗教思想。

(二)美國南方浸信會牧師往訪天朝的經過與影響

前面曾述及 1860 年 6 月，有三位美國南方浸信會的牧師往訪蘇州。其中一位名為花蘭芷的傳教士，後於 8 月前往天京。他雖曾要求以私人資格面見天王而未果，但仍受到章王林紹章的款待。其間，花蘭芷與林紹章也曾經就宗教問題展開辯論。在辯論中，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教義合乎真理，難以得到共識。花蘭芷牧師認為太平天國的宗教思想與聖經的真理有不合之處，太平天國應遵照聖經的規定進行禮拜，但林紹章則認為拜上帝教對於聖經的修改是適當的，儀式的不同是由於天王的新啓示所致。花蘭芷後來又指出，「如果天王得有天啓，我們可由校勘聖經所有的記載而決定其真偽。若是兩者相符，則是二而一的；若是不相符，則天王的新啓示即不能為真，因為上帝是亙古不變的。」²² 林紹章再度聲明此對中國人而言仍屬合適，並以中西之間的文化差異作比喻。但花蘭芷卻強烈反對，表示人的工作遠不能和上帝的工作相比。後來花蘭芷又試圖以書信方式與天王討論基督教義，他在同行牧師的協助下，摘錄部分《新約》的內容，並提出太平天國在這些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希望洪秀全能加以解釋。這些疑問包括了天王的身份和新啓示等。但由於他所提出的問題過於敏感，林紹章不敢呈給天王，最後又退還花蘭芷。經過了辯論和考察，花蘭芷返回上海後曾在《北華捷報》上發表其〈天京訪問報告〉，他表示：「我這次到南京訪問，本預期得到良好的印象。……當我離開南京時，我的觀點有了很大的變化。我所見到的，可以憂傷地說，是沒有什麼基督教，而只是某種名詞的假托，實施於一個離經叛道的偶像崇拜之上。」²³ 他認為，太平天國對上帝的觀念是受到曲解的，甚至比其他崇拜偶

²²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 1860.

²³ 同註 22。

像的中國人還不如，他們對於救世主的觀念也是十分淺漏的，竟將救世主的榮耀與另一位領導人所分享。總之，他認為要糾正太平天國宗教思想上的錯誤，可說是希望渺茫的。²⁴

花蘭芷的這項報告，使得不少傳教士對太平天國的良好印象自此改觀。許多美國傳教士開始對太平天國抱持否定的態度。例如，美國公理會教士衛三畏即認為，「關於（太平信仰）成為促進真道（基督教）一事，亦殊無信其必有效果的理由，而近五年來亂黨之行動，已表現一種殘酷性質及狂信主義，遠過於 1850 年初起之時了。」²⁵ 北美長老會傳教士安德哈巴醫師(Andrew P. Happer)表示，「上帝在無窮的智慧中，將使這些褻瀆神聖之罪如何結束，無人能預料。然而沒有一位基督徒，根據現在所獲得關於太平宗教的證據，而能夠同情於他們。」²⁶ 然而，當時也有部分傳教士仍對太平天國寄予同情與期望，曾和花蘭芷前往天京的赫威爾牧師即指出，「縱然那革命運動本身也許是錯的，或與其有關之種種是有害的，然而我們知道上帝是可以令其轉惡為善的。於此，我們不禁歡襟祝之。」²⁷ 但花蘭芷的報告還是造成了相當深刻的影響，甚至美國內部亦出現一些對太平天國不利的輿論，例如衛理公會刊物《基督倡導雜誌》的主編在閱讀過此報告後，即感慨地寫道：「我們所期望能在中國根深柢固的福音真理，竟會遭到如此的曲解，而花先生所言，我們不能不相信。」²⁸ 而在政治性的影響方面，由於此時英國政府已改變對華政策而傾向反對太平天國，遂利用花蘭芷的報告對太平軍進行批判。當時《北華捷報》的編者即於評論中指出，花蘭芷的這封信「對於在南京之天朝的褻瀆與欺騙，作了最好的揭露。所有關於太平天國信仰的期望，就這樣突然地

²⁴ 林家宥、梁碧瑩，〈論美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態度的演變〉。收入於廣東太平天國研究會，《太平天國與近代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18-319。

²⁵ F. W. Williams, *Life and Letters of S. W. Williams*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72), p. 356.

²⁶ *The Home and Foreign Record*, May, 1861, Vol. XII, p. 147. 轉引自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8 年），頁 1976。

²⁷ *North China Herald*, Jun. 30, 1860.

²⁸ *Christian Advocate and Journal*, January 24, 1861.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 120-121。

破滅了。」²⁹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夏禮(H. K. Parkes)也認為花蘭芷的報告是「傑出的、符合實際的和忠實的報導」。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在是年9月致英國外相羅塞爾的公函中，也引用了花蘭芷的報告，後來這些論述又被編入英國國會藍皮書中予以發表。英國外交官即是利用這份報導，塑造出一些不利於太平天國的輿論，此對太平天國的對外關係亦造成了相當不良的影響。

(三)羅孝全與洪秀全對於基督教義的辯論

1860年10月，羅孝全在歷經波折後終於到達南京。他除了受到天王的熱烈款待之外，也被委以協助處理外交事務的要職。天王也贊同羅孝全的建議，允諾讓更多的傳教士來天京傳福音，並可在城內興建十八座教堂，城外至少可設立二、三千處傳道所。羅孝全對此頗感振奮，曾致函友人表示，此乃絕佳的時機，能夠將福音遍傳於太平天國境內的六省三千多萬人，此一成功無疑將證明基督徒的驚嘆和欽佩。³⁰然而，不久後在兩人首度會見時，洪秀全即勸其改信由上帝直接向他啓示的太平宗教，甚至期望羅孝全能成為他的使徒，向外邦宣揚太平宗教的教義，羅孝全則對此感到相當驚訝。在此期間，羅孝全也積極地試圖改正太平天國錯誤的宗教觀念。他曾期望以美國浸信會版《聖經》的中譯本，來代替太平天國當時所用的英王詹姆士欽訂《聖經》的郭士立譯本。雖然羅孝全已體認到在天朝傳播福音真理的困難性，而其與外界的交流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監視，但太平天國對於教堂及佈道者的需求，以及他們誠懇坦率的態度，加以天王也願意和傳教士討論教義，因此羅孝全仍受到很大的鼓舞。³¹

他和天王曾經採取通信的方式對宗教問題展開辯論，而辯論的主題是關於「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教義、洪秀全升天的經歷、楊秀清的稱號「贖病主」、教會的含義及其領導等問題。³²在三位一體的觀點上，基督徒

²⁹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 1860.

³⁰ 史景遷 (Spence Jonathan D.) 著，朱葆慶等譯，《太平天國》下冊（台北：時報出版公司，2003年），頁163。

³¹ *North China Herald*, Mar. 30, 1861.

³² 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頁294。

皆相信聖父、聖子與聖靈各有獨立的位階，但又是同尊同榮的，本質和權能也都相同。但洪秀全則認為耶穌的位階應低於天父。他又堅持自己為天父之子和耶穌之弟，而天父和天兄使他成為統治者。羅孝全曾詢問天王修改新、舊約的合法性，並表示洪秀全自稱為上帝次子和耶穌之弟，且又奉上帝旨意降臨人間的說法，並不符合聖經的真理，他也認為楊秀清「贖病主」的頭銜是不適當的，因為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世主。但洪秀全堅持自己對聖經的解釋，認為他的啓示「真約」和聖經是一樣重要的，他更要求羅孝全相信他曾經上過天堂，並和上帝有親屬關係。為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還引用《聖經》〈約翰啓示錄〉中的事蹟，表示「在〈約翰啓示錄〉裡，約翰親眼看見羔羊站在天父面前，而羔羊是長兄。」³³ 關於東王楊秀清的稱號，洪秀全則認為東王亦為天父的愛子，他雖然不贖罪，但是他贖病。至於在教會及其首領的含義方面，羅孝全認為「教會只包括受聖靈刷新的、受過洗禮和改造的人。基督是教會的唯一首領」。但洪秀全認為羅孝全所說的教會是精神層面的教會，而太平天國要在這個世界上所建立的是「塵世的、全體人類的教會與王國」，其中天父、天兄、天王和幼主是神聖的四位一體，是共同的首領。他甚至曾要求羅孝全只承認太平天國是唯一可被稱為「國」的政體。1860 年底，洪秀全更頒發了《賜通事官領袖接天義羅孝全詔》，要求羅孝全仔細研讀他所頒發的各項詔書，並協助傳播拜上帝教。由此可知，羅孝全與洪秀全對於基督教義的認知與基本立場充滿了分歧。這些宗教上的分歧，使羅孝全與洪秀全形成相當的隔閡，而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也因此逐漸和他疏遠。

克勞弗牧師曾轉述羅孝全對於在太平天國境內傳福音的觀感，羅孝全此時已表示，他對引導太平軍進入上帝國度的想法，感到非常失望。他明確指出，「在和平未到之前太平軍並不需要我們。除了作幾次訪問，與少數顯要人士佈道，並捐送些書籍外，我們無事可為。」³⁴ 1861 年底，羅孝全曾於寫給教會的信中明確表示，洪秀全邀請他至此，並非期待他宣揚基督的福音，而

³³ 同註 32。

³⁴ Crawford to Poindexter, Shanghai, April 5 1861.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 145。

是希望他宣傳太平宗教的理念，勸導外國人接受這個信仰。羅孝全甚至指出，在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的心目中，並未真正接受福音，但爲了政策的緣故，他們仍給予了寬容，而此地的傳教事業幾乎已沒有成功的希望。總之，此種在宗教內涵認知上的分歧，使得洪秀全和羅孝全間的交流出現了很大的隔閡，更埋下了日後羅孝全離開天京的種子。而其他的傳教士在和天王的宗教辯論中，也逐漸體會到，要糾正太平天國信仰中的錯誤部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四)傳教士透過洪仁玕影響太平宗教的努力

除了和天王辯論宗教問題外，傳教士們也曾將希望寄託在干王洪仁玕身上。洪仁玕曾在香港基督教會工作多年，又是接受過洗禮的基督徒，他不僅認識許多外國傳教士，和洪秀全又是同族，因此，外國傳教士都認爲洪仁玕是能夠以基督福音來影響太平天國宗教思想的最佳人選。1858年春，洪仁玕在倫敦傳教會的協助下來到天京，隨即受到洪秀全的重用，被封爲精忠軍師干王。傳教士期望透過洪仁玕，促使太平天國領導階層對基督教義產生正確的認知，並促進在太平天國境內傳播基督教。但洪仁玕到天京後並沒有完全按照傳教士的期望去做，加上天王對個人新啓示的信念極爲堅定，他也難以對之發揮影響。事實上，洪仁玕所實行的友誼政策，主要目的之一係在於通過與傳教士的來往以爭取西方外交官的好感，進而使其承認或支持太平天國，但傳教士的主要考量則在於透過洪仁玕以改良太平天國的宗教。1860年8月，一些英美傳教士在蘇州與洪仁玕會面時，曾提出了許多宗教方面的問題，其中包括對基督教義的理解以及拜上帝教是否有遵循聖經的真理等。洪仁玕就英美傳教士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也表示洪秀全的宗教思想雖然有些錯誤，但卻是一位非常虔誠的教徒。他說只要假以時日，他會設法影響天王去改正部分錯誤的宗教觀念。然而，在幾次的會談中，這些傳教士們也體會到透過洪仁玕來改變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仍有其困難，因爲他雖然展現了友誼，但他仍舊完全服膺太平天國的宗教禮制和精神，其本身仍採取多妻制，即是對基督教真理的破壞。而此次與洪仁玕的會晤，也使得不少在上海的傳教士們對太平天國的態度開始改變。此外，在經過長達數月的宗教辯論之後，

洪仁玕亦深知，邀請傳教士來太平天國境內傳教其實是徒勞無功的。在 1861 年底，美國傳教士卡克士牧師(Reverend Josiah Cox)至天京訪問時，曾詢問洪仁玕關於長期留於此地傳教的可能性，洪仁玕竟然答以：「傳教士不應當來此。因為教義的不同，天王是不會允許與他不同的教義在此出現的。」³⁵總之，外國傳教士試圖透過洪仁玕以改變太平宗教的計畫，最後終告落空，而傳教士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關係也已邁入尾聲。

四、傳教士與太平天國關係的結束及其影響

(一)美國傳教士的態度轉趨冷淡

自太平天國興起以來，西方傳教士即對之抱有頗高的期望，雖然亦瞭解其宗教含有異端色彩，但傳教士仍希望能透過重新教導與福音真理的討論，來改正太平宗教中謬誤的部分。洪仁玕身為新的領導階層，對現實情況較為瞭解，而在與外籍人士來往時，也曾刻意將天王的拜上帝教色彩淡化，他原來認為一個改良式的太平宗教，應較能獲得西方國家的贊同，但傳教士在體會改正太平宗教的困難後，態度多已轉趨失望，他們的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交官往後的決策。而羅孝全雖曾積極鼓勵其他傳教士來天京傳教，但至 1861 年底，大多數新來到中國的外籍傳教士，皆已遵照北京條約的規定轉往華北從事傳教活動，故幾乎無人響應羅孝全的號召。此外，美國由於內戰的影響，也使得在華傳教活動處於低潮。1861 年南北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南方為基礎的來華差會便遭到頗大的困難。當時美國南方浸信會和監理會曾暫停供應其在華傳教士的經濟來源，以至不少傳教士被迫擱置佈道工作，而靠著經商或翻譯維持生計。在此種情況下，美國傳教士對於太平天國的關注也自然趨於冷淡。

由於太平天國和傳教士們的信仰互不相容，終於使那些少數尚存期望的

³⁵ J. S. Gregory, *British Attitudes and Policy towards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 (London: Dissertation of London University, 1957), p.332.

傳教士，開始對太平天國產生了反感。在 1860 年北京條約簽訂後，英、美等國已再次從清廷方面正式確認了關於赴內地傳教的權利，傳教士在體會改革其宗教的困難後，對於具有濃厚異端色彩的太平天國在態度上也日趨冷漠。此外，在太平天國方面，自 1860 年 8 月太平軍在上海遭到英法聯軍阻擊以來，其內部對外國人即逐漸產生反感。至 1861 年 9 月的安慶之役失利後，其原先對外的友誼政策則出現了更大的變化。而太平天國最初對於傳教士所展現出的友善態度，也與以往有所不同。當時卡本特牧師即認為，從下層軍官對他的招待即可證明，傳教士已不為太平天國所歡迎，而克勞弗牧師對此種情況也有深刻的體會。³⁶ 此外，傳教士們曾轉述羅孝全對自己和太平天國之間的關係感到相當悲觀。他們指出，羅孝全曾提及他目前之所以能留在天京是因為洪秀全對他有好感，但其他的太平天國官員卻時常希望他離開此地。

(二) 羅孝全離開天京所造成的影響

羅孝全可謂早期來華的傳教士中，唯一直接參與太平天國事業的牧師，其在太平天國的任職，雖主要目的是為了傳教，但對外曾得到不少外國人士之同情。然而，羅孝全在天京的作為，也曾遭到《北華捷報》的英國編輯所批評，在 1861 的 9 月 7 日社論中，即指出羅孝全已成為天王所利用的工具。後來經過上海傳教士的澄清和解釋，《北華捷報》才於 9 月 14 日的社論中予以更正。事實上，羅孝全在協辦政治事務方面，到後來亦不順遂。1860 年 11 月，容闓在《西學東漸記》中回憶訪問天京時，看見羅孝全身著黃色長袍，而懷疑他究竟是洪秀全的宗教顧問，或是太平天國的國務卿。根據《北華捷報》的記載，洪秀全確於 1861 年 2 月任命羅孝全為外務丞相，職務即類似國務卿。³⁷ 在他任職期間，太平軍曾答應英國在一年內不進軍上海和吳淞附近區域，後來又協助楊篤信等英國傳教士取得關於傳教自由的詔書。但至 1861 年底，由於英國向太平軍所提關於不進軍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要求遭到嚴拒，太平天國的對外關係也益為惡化，羅孝全對此即頗感失望與灰心。因此，原

³⁶ 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 146。

³⁷ *North China Herald*, Feb. 8, 1862.

先對太平天國懷有極大熱誠的羅孝全，深感赴天京後長期以來無法改善太平天國錯誤的宗教觀念，加以政治局勢的日趨不利，終於在 1862 年初，以與洪仁玕的糾紛為藉口離開了天京。他離開天京後，曾不斷發表對太平天國不利的言論，指出太平天國其實充滿了腐敗與黑暗，只願宣傳「政治的宗教」，不許外國傳教士任意活動，且不贊成國際貿易。他明確地表示，「我過去曾經是他（即洪秀全）的革命運動的朋友，……但在他們之間居住了十五個月，並且密切觀察他們的活動——政治的、商業的與宗教的——我已完全地轉變，堅決地反對他們。……洪秀全對我相當友好，但我相信他是一個狂人，不適合作為一位領導者。……在傳佈基督教方面，完全無用，甚至比無用更糟。他僅是為傳播他個人政治性的宗教，將自己和耶穌置於同等的地位。由上帝、耶穌、他自己以及他的兒子成為一切的統治者。」³⁸ 羅孝全的評論雖然未盡真實，但對太平天國造成的衝擊頗為沉重，因為他曾是洪秀全的宗教導師，又在天京居住了一年以上，對太平天國的內部情況自然知之甚詳。因此，他的言論在當時不僅使得西方人對太平天國更趨失望，更為那些早已希望改變中立政策的列強，提供了理論基礎。《北華捷報》的英國評論即指出：「我們相信（羅孝全牧師的）評論是確實的，當這些消息傳到英國的時候，一班人必放棄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廣大同情，從此我們（在華）的海陸當局，可用武力，毫無拘束的，對上帝與人類的敵人進攻了。」³⁹ 總之，傳教士與太平天國關係的結束，使得太平天國失去了對其最友善的外國朋友，而此對於太平天國往後的對外關係，也造成了相當不利的影響。

五、結論：

十九世紀中期，隨著太平天國在華東地區的進展，美國傳教士對其在華福音事業的擴展，曾抱持熱切的期望，即在瞭解太平天國宗教的內涵與基督

³⁸ H. A. Tupper, *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Philadelphia, 1860, p. 88. 轉引自 Teng Ssu-Yu,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Reprinted in Taipei, 1972), p. 199.

³⁹ *North China Herald*, Feb. 8, 1862.

福音不同之後，他們仍試圖改正其教義。最初，他們多認為太平宗教的缺點是由於缺乏教導，而不是缺乏真誠。由於當時清廷尚未正式開放外國傳教士赴內地傳教，因此許多美國傳教士即不斷藉著私自訪問太平天國的機會，以瞭解在其統治區域建立福音事業的可能性。當時來華的美國傳教士，基於其自身的立場與對中國事務的瞭解，也曾影響了美國駐華外交官員的對華政策，他們曾經是對太平天國最友善的朋友，但在體會到無法改變充滿異端色彩的太平天國宗教信仰後，態度遂轉趨悲觀和失望。1862年羅孝全的離京，不僅象徵太平天國與傳教士關係的結束，更對太平天國的對外關係造成頗大的衝擊。至於太平天國方面，曾期望透過與傳教士的交往與友誼，以獲得歐美國家的外交承認與支持，而經過長期的接觸與瞭解，太平天國的領導階層也體會到其本身的觀點與英、美基督徒實有深刻的差異。事實上，洪秀全的新啓示和太平宗教的教義，可說是太平天國立國的精神基礎，亦為其領導階層的權威來源。因此，洪仁玕雖曾期望對之進行部分的改良，以爭取外國人士的諒解，但亦無法對此宗教的核心價值作太大的更動。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傳教士所不能接受者，正為太平天國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因此，雖然雙方曾有過相當友好的交流，但此種關係最終仍不免畫下休止符。

另一方面，至太平天國之役落幕後，仍有不少美國傳教士對其失敗抱持遺憾的態度，丁韞良即曾表示，「現在時間已過很久了，及今回顧，由以後的歷史所呈現的後果觀之，我們仍要質疑當時外國若是採取另一種政策，則造益於中國更大否？……當革命運動正臨成功的邊緣時，一般短視的外交官的成見，即決心反對之，遂喪失了千年不可得的機會。」⁴⁰ 贊臣牧師(J. E. Johnson)甚至認為，因羅孝全未能及時趕到天京，去對洪秀全作有意義的影響，致使美國傳教士失去了使中國改變宗教信仰的最佳機會。⁴¹ 美國長老會的史丕亞(Robert E. Speer)牧師也指出，「在整部中國歷史中，曾否另有給予基督教會像這樣的良好時機，誠屬可疑。教會也許可以進入每一破壞的神廟，而在其

⁴⁰ Rev. Robert E. Speer, *Missions and Modern History*, Vol. I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4), p.58.

⁴¹ J. E. Johnson, *Tai Ping Wang* (New Englander, Jun.20, 1871), p.405. 轉引自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頁222-223。

中舉行基督教的禮拜儀式，在每一被廢棄的偶像神座上宣傳福音。……那正是將中國成為福音化的大日子。上帝似乎將天空的太陽停止，但時機最後仍過去了。」⁴² 由於太平天國拜上帝會採納了一些基督教義，顯示十九世紀初期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型態，諸如語言工具之不足等，而造成洪秀全此種錯誤的異端思想。因此，傳教士在福音事業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史丕亞牧師即認為，「洪秀全所自行創造的過程，他所發展的扭曲的神學，他所採納的異端，他所陷溺已深的錯誤，在在指明我們徒將福音之偉大的和革命的勢力拋給一個國家一如中國者，一任其自由發展而無傳教士的指導，那是不夠的。」⁴³ 總的而言，太平天國的宗教內涵雖因包含洪秀全的新啓示而富有濃厚的異端色彩，但其對於禁拜偶像的堅持和崇敬上帝的觀念，卻撼動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也是西方傳教士長期以來所無法成就的願景。因此，即使在太平天國運動落幕之後，仍有不少美國傳教士深深懷念著那段令人難忘的往事。

⁴² Rev. Robert E. Speer, *Missions and Modern History*, Vol. I, p. 65.

⁴³ 同註 42。